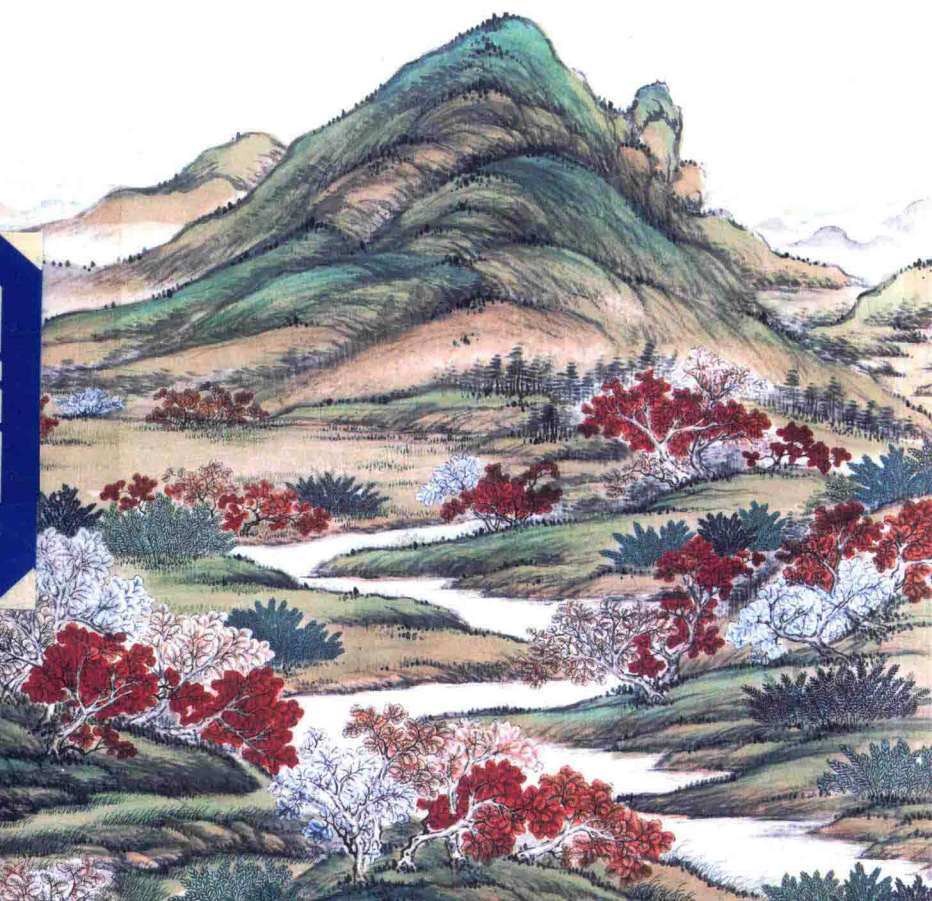


人间词话

释评

王国维 原著

杨亮 释评
王少帅



人间词话释评

王国维 原著

杨 亮 王少帅 释评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释评 / 王国维著; 杨亮, 王少帅释评.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46-1373-5

I. ①人… II. ①王… ②杨… ③王… III. ①词(文学)—诗词研究—中国—古代 ②《人间词话》—注释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4453号

人间词话释评 王国维 著 杨 亮 王少帅 释评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文杰

编辑助理: 代莹莹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30.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王国维的世界与世界中的王国维 /001

第一部分：人间词话 /001

《人间词话》正式发表共六十四则。从1908年至1909年间，分三期连载于上海的《国粹学报》上。这是王国维亲自从稿本中删定的最精华部分，大致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则至第九则为“境界篇”；第十则至第二十则为“唐五代篇”；第二十一则至第三十七则为“北宋篇”；第三十八则至第五十则为“南宋篇”；第五十一则至第六十四则为“杂论篇”。

第二部分：人间词话删补 /135

人间词话删补部分共四十九则。为赵万里从《人间词话》手稿本中择录四十四则，从王国维旧藏《蕙风琴趣》选录两则，以及赵万里自己的《丙寅日记》中辑录两则综合而成，共四十八则，并于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三号上。1960年，王幼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人间词话》过程中，将非手稿本中的四则词话移出，又从稿本中择录五则，形成今天四十九则的局面。移出的四则，又归入到遗补部分。

第三部分：人间词话遗补 /221

遗补部分为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及其删稿选录四十九则之外剩余的十三则，即原来王国维手稿本共一百二十五则。王国维亲自选定六十三则，初刊时又临时补写一则（这一则为初刊六十四则中的第六十三则），共六十四则。然后赵万里等在几经删选剩下的六十二则中，又以“人间词话删稿”的名义发表四十九则。最后剩余十三则，这一部分就是对这遗留词话的简略释评。

第四部分：静安词话辑补 /243

辑补这一部分共三十八则。主要由赵万里、王幼安、徐调孚、陈鸿祥、陈乃乾诸家从王国维其他的著述、序跋，甚至是谈话记录中辑录而成，同时里面也加入了彭玉平近年来最新辑录的若干则。这部分内容因各家辑佚而成，虽然来源不一，择录标准不同，但是对完善王国维词话理论，了解王国维思想仍有极大价值。沧海遗珠，仍可一观。

附录一 王国维年谱简编 /293

附录二 王忠愍公遗书序 /314

王国维（1877—1927）

中国学者。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省海宁人。清秀才。生平著作 62 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一称《王国维遗书》）的有 42 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王国维的世界 与世界中的王国维

王国维生前肯定没有想到，他这样一个单纯学者在自沉之后成为后世不断关注的对象，因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影响甚至上升到中国文化命脉延续的高度。

一、无定论的死因与各种猜测

近百年来，对王国维自沉弃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想不通的是，当时的王国维声望如日中天，执学界之牛耳，怎么能以这么决绝的方式与世间做一彻底了断。

王国维生前的一些书信资料和他去世前接触到的一些当事人的记载是可查据的资料，可是人们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却是“各抒己见”。大致说来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殉

清死节；二是丧子之痛加上与好友罗振玉断绝情谊；三是罗振玉逼债，生计穷困无着；四是在新旧文化激变中心灵冲突无法解脱，因湖南大藏书家叶德辉被杀，深恐革命军入京后辱及自身。

其实这四种说法细致分析起来可归为两个方面：第一，罗、王之间的关系，包含王国维失子之痛、友尽之伤以及罗振玉逼债等；第二，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包含殉清死节和对新旧突变时局的恐慌。当时，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在《王国维之死》一书中将所有材料证据罗列出来，要还王国维死因一个客观的事实真相，这当然有为罗振玉辩驳的意思。

王国维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仿佛可以推测王国维是因外界时局之变而死。早年王国维的《教育小言十则》中有关于自杀的一番言论：“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所以说，自杀之因在王国维看来不是“入于绝望之域”就是“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

王国维自身陷入这种不得自拔的困境，一方面是因外在时局的动荡，另一方面是自己忧生忧世的敏感性格造成的。也许，性格决定命运，外表看起来木讷呆滞的王国维有着常人难以了解的世界。

（一）从科举不第的秀才到宠遇隆恩的南书房行走

按说外在时局的动荡和学术至上、专心研究的王国维没有必然关系。可是政治时势和思想文化遽变，不得不让身处其中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

1923年4月，王国维因罗振玉朋友升允的引荐被清逊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与同时任命的另外三人均为进士出身，独有王国维以秀才诸生的身份入职；1923年7月，王国维又被溥仪加“恩赏”食五品俸；1924年1月，溥仪“降旨”允许王国维以布衣身份享受紫禁城骑马的待遇。这在有清近三百年间，是自朱彝尊之后的唯一一人，恩遇不可谓不隆。很显然，王国维走入了前清“遗老”的行列，这是好友罗振玉的引导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从此他用对逊帝溥仪的“忠心”，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王国维沉湖后，罗振玉命其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写遗折上书逊帝溥仪，里面有“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果然，逊帝溥仪感念王国维忠心，于是发出上谕：“……通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思予谥忠愍。……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

从受溥仪恩遇，到死后封赏，仅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其间因控制北京政权的冯玉祥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而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随车驾前后，以“君辱臣死”的古训，欲投御河自尽，未果。后又专程赶往天津为溥仪祝寿。所以，王国维留辫子，效忠前清无疑。这种“效忠”并非王国维的本意，一个人一旦踏入政治的泥淖中，想再回头恐怕就很难了。

王国维受过新式教育，虽有旧学根底，但仍倡导西学，痛恶科举帖括之学，唯以新学自任。他只是秀才出身，在前清是籍籍无名之辈，而因逊帝溥仪的礼遇备受殊荣，所以在步往新学的路上，实际行动中显露出仍然是传统士大夫的忠君之举。在《清史稿》中王国维并不在“儒林传”而是被放在“忠义传”。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内心矛盾和挣扎之处。

（二）罗、王之交：从莫逆之交到形同陌路

对王国维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罗振玉。当王国维自沉之后，罗振玉以“殉清”为赴死之由代写遗折。殉清之说貌似有据，而在罗振玉内心却又是另一番考虑。这不得不说到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的恩恩怨怨。三十年的莫逆之交，怎奈一朝事变，变得形同陌路？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中“经此世变”固然可解作逊帝出宫之变而殉清，亦可解作长子早丧，儿媳离家，老友中绝，经此变故，伤心之至而赴死。

有很多天才型的人物并不擅长考试，1898年，王国维

放弃科举不得不说是明智之举。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从小学到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就是背书和服从。学习课程，把语法或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好，模仿出色，这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这种教育唯一的结果是贬低自我，让人变得无能。”中国的科举考试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人论述过科举如何扼杀人才，如何不合理，然而，科举考试存在千余年肯定有其合理之处，不过，面临清末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土崩瓦解的局面，想仅以“四书五经”的考试解决现实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然不够。

对于放弃科举，王国维大概对自己的才分有自知之明，要知道，清代科举考试到1905年才废除，他这种选择要早得多。大概江浙本身处于风气渐开的局面，同时，此地有做师爷的传统，他的选择应该是务实而又明智的。

王国维为了谋生，接替同乡许家腥在上海《时务报》任文职书记一职。这也是他接触新学的开始。在《时务报》任职之余，他注意到东文学社成立，产生了学习日文以求新知的想法。在征得汪康年兄弟同意的情况下，他每天可以去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但《时务报》的工作迫于生计，不能不干。罗振玉在巡视学员时见到王国维《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这首气魄雄壮、格局不凡的诗，

让罗振玉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王国维。后世有人责骂罗振玉是商人，这也不假，成功的商人必须具有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这才是“商人”事业成功的保障。罗振玉此举，恐怕不是一般迂腐的读书人能做到的。否则，王国维在报社做事，怎么没人发现王国维的才能？中国历史中不缺乏人才，而是缺少欣赏人才的伯乐，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的歌咏之作呢？历史证明，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发现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发现不仅成就了王国维，也成就了罗振玉。

罗振玉是博物大家，是中国传统学问的集大成者，而王国维凭借对甲骨文、敦煌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奠基者。罗振玉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守护者，而王国维是开启者，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似乎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罗振玉对并未谋面的王国维的欣赏之情并不奇怪，只有真正的人才之间才会“惺惺相惜”。貌不惊人的王国维在诗歌中的抱负被罗振玉敏锐地捕捉到了。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可以说，没有罗振玉的提携及知遇之恩也不会有后世的王国维，此时的王国维还在为生计奔波，以学术为志业的想法在他心中恐怕连理想还不是，而罗振玉如果没有王国维的帮助，在学术上也不可能得到大的伸展。今天看来，将二位学术大师的相遇看作是中国学术史上灿烂的一幕，并不为过。

在其后的交往中，罗振玉在物质上给予了王国维很大

的支持，王国维也为罗振玉做过不少学术工作。二人在学术上通力合作，政治上相互支持，这在清末民初的时局动荡中显得弥足珍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王二人东渡日本避难，将罗振玉在中国收集的大量图书和古器物资料一并携带上船。在流居日本五年多的时间里，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学术和思想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二人在勘误汉学家沙畹就中国简牍而写的一本书时，合作完成《流沙坠简》一书。当时“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相继发现，使学术研究别开生面，逐渐创立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多门新学科，学术领域大大拓宽。

以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学术前瞻性，因罗振玉自己收藏有一些甲骨，二人首先展开对“甲骨文”的研究。罗振玉重在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而王国维则是重在通过甲骨文记载来研究殷周时期的社会历史，二人合作完成《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为后来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世所谓的“罗王之学”也源于此。可以说，罗振玉的学术带有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色彩，而王国维的学术则带有更多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特点，不再是单纯的考据之学。避居日本的五年，是王国维学术思想和学科构建的黄金时期。王国维回国后的学术研究以及中西交流，使中国的学术融入了世界。

罗、王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有政治上的不如

意也有家事上的不和睦。王国维任职清宫侍从，多半是出于溥仪知遇之恩，对当时的政治时局并没有太多的关心，多以学术需要在清宫奉旨检查审定各宫所藏古彝器，此外就是给溥仪上奏《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等提出文化保护的建议。这与罗振玉在溥仪身边任职参与党派之争不同。而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升允引荐，供职溥仪身边，这也不能认定罗振玉没有出于党争需要而如此安排。我们可以认为罗、王二人彼此共进退，供职清宫王国维是接受的，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我们知道，王国维接受西学，并以学术至上为原则。在罗振玉出于政治目的要求王国维联合升允弹劾郑孝胥时，王国维并没有答应。始终听从，一次不从，嫌隙即起。尽管在罗继祖的口述中说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效忠于前清，都是遗老，但他们之间内在的分歧也是事实。

罗、王既是挚友又是儿女亲家。王国维钟爱的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的掌上明珠罗孝纯结为夫妻。二人婚后八年，情意日笃。1926年9月王潜明因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长子英年早逝，这对王国维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而罗振玉不但没有尽朋友之责多加劝慰，反而在此时因王国维继室潘氏善后失当之琐事，以及数年来婆媳之间的龃龉，带上女儿不辞而别。后来王国维两次将王潜明在海关任职的抚恤金等费用寄给罗孝纯，均被罗振玉拒收退回。

王国维痛失爱子，而罗振玉的爱女也成了未亡人，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罗振玉看来，王国维家中婆

媳矛盾处理不好，王国维有很大责任。王国维在第二次寄送抚恤金时，小心翼翼地说：“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家庭琐事的矛盾上升到对彼此人格尊严的怀疑。本来就有丧子之痛，加之儿媳归宁，好友绝情。客观来说，在这一件事上，王国维确实负有责任，王国维短于应付世间的事情罗振玉应该是知情的。不过，王国维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也承受不了一系列的打击。往日的好友，今日却形同陌路，彼此不能有半分的宽慰，这巨大的反差令王国维不能理解，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而昔日悲剧哲学的学习，使他感到人生就是一场注定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数月之后，当王国维的死讯传给罗振玉时，无论罗振玉内心怎么想，最有资格对王国维评价的就是他了。他在为王国维撰写《祭王忠愍公文》里回忆了两人之间三十年的交往：“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暗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廩，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

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

罗振玉声称可以逆知王国维的心事，显然他是有愧于王国维的。罗振玉对刘鹗之孙刘蕙孙说过：“（王国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所以，所谓的殉清而死与丧子友绝之痛相比，王国维之死肯定与后者关系密切。尽管有人开脱，相信以王国维这样敏感式人物，挚友亲朋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是促使他生无可恋、决心赴死的重要砝码。现实生活的政治风云是大家都面对的，而偏偏王国维沉湖自尽，焉能是一概而论的大环境所致？这就不得不说到王国维个人的性格。

（三）从忧生无计的现实现到万念俱灰的心路历程

追问王国维为何而死？与其找一些冠冕之由，不如说王国维为己而死，为了遵从自己的内心想法而死。五十年的人生历程，王国维经历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这期间幼女夭折、孙女早殇之事不止一次。幼年无知，全赖姑祖母和叔祖母抚养长大。后来几经生离死别之痛，刻骨铭心。人生之不可拒、不可避、不可

预知在王国维心里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匆匆五十年，亲人辞世哀讯骤降频频。磨其心志之余，人生不虞之祸的打击，使王国维处世特别谨慎敏感，与常人感受有很大不同。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中国读书人，特别是浸淫于传统诗文中的旧式文人，对人生痛苦的经验的感受要比常人敏感得多。

中国诗词本身都是表达哀伤悲亡的多，表达欢娱之情的少，有时候我很感叹生离死别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主题，即使如《古诗十九首》这样的作品，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及时享乐的精神何尝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中国文人身上承担的宿命色彩太过严重。儒家的责任担当，忧国忧民的情怀浸透了每个读书人的基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建立功业，实现人生理想，所以中国文人作品中的忧患意识、伤别意识、死亡意识特别多。王国维诗词也是如此，其流露出的人生无奈、无常的苦痛几乎成为一个重复的主题。潘知常《生命美学》中说：“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于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剧。而要使苦难为人所知，就要借助于审美活动；苦难是共同的，只有痛苦才是自己的，因此苦难只有转化为自己的痛苦时，才是所谓的审美活动。正如死亡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只有个人才会有的对于死亡的意识，因此只有死亡意识才会走向审美活动。也因此，‘生命的悲悯’才得以脱颖而出。”我们很难想象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是不是将学术当作自己抗拒人生苦痛的工具，所以看王国维作品确实和迷宫一样让人琢磨不透，他的心事几乎永远处

于欲言又止的状态。

海宁王氏是书香门第，绵延不绝，王国维追慕远祖宋代的王稟，感怀其“勋绩忠烈”，之后海宁王氏代有勋荣，读书求仕代不乏人。王国维生活在这样一种有着光辉历史的诗书之家，耳濡目染，这是一种荣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负担。因为在先人忠勇事迹的笼罩下，一种不求远胜，但求不辱没先人的心理会造成“焦虑”。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王国维家已经由官宦之家成为拥有中人之产的小康之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兄弟二人期许甚高，曾有《元旦口号示两儿》道：“敢羨牡丹闲富贵，须知巨梗撼风雷。”又因为随着社会动荡不安，家中又频遭亲人离世之痛，经济负担也随之加重，所以王乃誉在对长子王国维求学方面要求十分严格。他希望王国维能够光耀门楣，支撑门户，及早为家里分担。

王国维童年生活孤独，形成内向型的性格，又不善交际，其父王乃誉认为他“其行讷钝，好谈时务”，而王国维自序道：“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结合王国维生活环境和自身的身体状况，自幼形成忧郁的性格底色，伴随其一生，他在“忧生”的困惑中，一直探索人生的迷雾并苦苦找寻答案。这个答案的寻找是王国维在不断转换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完成的。他在传统中国旧学基础上由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学习转而以文学作为自己人生答案的钥匙。但在文学研究过程中他是清醒的，比如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他就跳出了才